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既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高度重视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弘扬，不仅在厉行节约上发表过很多重要论述，更以身作则，带头践行。毛泽东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一深刻论断不仅积极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至今仍有着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

第三次反“围剿”后，中央苏区力量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根据地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万，但与国民党反动派相比，仍是处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的“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正是倚仗这种力量上的悬殊，国民党“不但组织了武装力量进行军事上的‘围剿’，而且在经济上实行残酷的封锁政策”“他们想用饥饿、死亡、烧杀的政策企图来扑灭苏维埃革命”，中央苏区物资严重匮乏，广大军民生活异常艰难。

为确保苏区建设和革命事业持续向前推进，临时中央政府在经济建设上一手抓生产，一手促节约，中央苏区掀起了一场“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亲自拟写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十四号》强调，“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尤其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这一切节省，虽在各部分为数甚少，但积少成多，并可以养成苏区中更加刻苦、更加节省的苏维埃工作作风——

中央苏区的节省运动

□ 樊得智 张大勇

这是万分必要的。”训令还强调，经费节省“决不是工作减少，相反的，在刻苦的精神之下，还要使工作的效能更加增大起来。”

1934年，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毛泽东实事求是、高瞻远瞩，进一步提出“经济服务于战争”的指导思想，确定“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强调要“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一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此后，在苏区掀起了一场“节省运动”。

“节俭一文钱即可对革命有一分的帮助，谁要浪费一文钱实等于革命的罪人”

节省运动从1932年开始，《红色中华》发表社论，提出“节俭一文钱即可对革命有一分的帮助，谁要浪费一文钱实等于革命的罪人”。

这期间，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为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首先带头节

约，他每天的生活标准只有三钱盐、二钱油，穿的衣服也总是缀满补丁，按规定他的油灯可点三根灯芯，但他坚持只点一根，从不搞特殊。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也与苏区军民一样，过着“有益同咸、无盐同淡”的生活。

积极倡导个人节约和捐献。1934年3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通过《红色中华》发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奋斗”的号召，提出节省的九项措施，中央政府总务厅、国民经济部等党政机关带头响应，政府工作人员主动要求减少伙食给养，“免发夏衣”，决定自己开荒种菜，严格落实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等规定。著名的“三升米运动”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一天，毛泽东主席叫来时任云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区委书记的朱开铨，对他说，前线红军需要粮食，但库存不多，请云集区带个头，号召每人节省三升米。朱开铨回到区里马上进行动员，大家听说是毛主席的号召，无不积极响应，短时间内就捐出9000多担米。

裁减不必要的工作人员。1934年2月，苏维埃政府发布第7号命令，重新规定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编制，裁减不必要的工作人员，目的是减少政府开支，“提高劳动纪律，提高工作速度

和效力。”瑞金县苏维埃政府积极拥护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坚决裁减后方非必要工作人员，节省一切非必需费用。3月份全县县区乡三级共裁减283人，比上一年10月至12月减少509人，减少近一半。特别是县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3月份裁减至116人，人员压缩了2/3，为苏区各级政府节省了大量行政支出。

加大对贪污浪费的惩戒力度。在积极倡导和率先垂范的同时，毛泽东特别要求公职人员要带头廉洁节约。他主张按照惩防并举的方法，对党员干部进行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领导制定并执行《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等相关法律措施，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工农检查委员会等机构，同时鼓励民众主动揭发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分子。当时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第26号训令规定：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毛泽东直接领导和参与惩处了一批贪污腐败分子，有效遏制了中央苏区存在的贪污浪费现象，一方面清除了贪污腐败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另一方面也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廉政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将军农民”甘祖昌的“六不”

□ 龚齐珍

甘祖昌1905年出生于江西省莲花县一个农民家庭，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红军，1935年参加长征，后又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7年8月，他带领全家大小解甲归田，被称为“将军农民”。2013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向与会人员重点介绍了甘祖昌的夫人龚全珍，亲切地称呼她为“老阿姨”，并在讲话中介绍了“将军农民”甘祖昌，号召全国人民要一代一代把革命精神传承下去。

不忘宗旨 不恋官位

1955年金秋，新中国成立的第6个国庆节前夕，正在疗养的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甘祖昌同妻子龚全珍谈起了他评军衔的事。他说，自己一直在搞后勤工作，业绩平凡，对中央军委评定他为少将军衔有意见。龚全珍说，是评低了吗？甘祖昌说，不是，是自己的军衔评高了。尽管他后来再三向中央军委申请降级，但中央军委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的功绩和一贯表现，还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坚持授予他少将军衔。身为少将的他却始终不忘宗旨、不恋官位。由于1951年敌人破坏引起的一次车祸对他的大脑造成了损伤，他认为自己不能从事部队重要领导工作，他不仅多次谢绝组织上的照顾，还先后三次写申请报告要求辞去后勤部部长职务，回去建设家乡。他在报告中写道：“请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省莲花县当农民，和乡亲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他认为，活着就要为党和国家做工作，做不了复杂重要的工作，就做简单的工作，绝不能无功受禄，绝不能不劳而获。可见他辞官回乡身体不好只是原因之一，真正深层次的原因是：他认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为人民服务，都可以为人民谋幸福。

不讲待遇 不计得失

甘祖昌回到家乡后，当地政府考虑到他是一位开国少将，按军衔待遇规定，他应享受相应的住房条件，就想为他拨出专款盖一栋房子。但他却谢绝了地方政府的好意，多年和两个

弟弟共三个家庭挤在一栋老宅里。后来，家里人口增加了，老房子实在住不下，他就带领全家老小自己动手打砖做瓦，建了一栋普通民房用来居住。他经常对人说：“我是回来种田的，不是回来当官做老爷的。”同样，他从新疆回来时，新疆军区派了一名警卫员一直跟着他，到了老家后不久，他就对警卫员说，“我是回家当农民的，你再给我当警卫员不合适”，硬是把警卫员打发回去了。同时，军区考虑到他回乡后出行不方便，几次提出要给他配备一辆小车，他也谢绝了。长期以来，他都是步行工作，甚至上县城开会，也是步行去。

甘祖昌回到家乡当农民以后，组织上陆续安排他担任了一些社会职务，如：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江西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等。每次去北京、南昌开会，他都是从莲花县辗转近百公里的山路赶到萍乡，再搭乘去南昌的火车，一路非常辛苦。时任江西省政协主席的杨尚奎和甘祖昌是同年出生，在一次省政协会议休会期间，他对甘祖昌说：“老庚，你是省政协副主席，我们给你安排好住房，你把一家老小都接到南昌来，就在南昌安家，这样工作方便。”甘祖昌又谢绝了他的好意，他说：“我还是住在老家好，这样方便劳动，我只是个农民，不适应城里的生活。”

甘祖昌更是不计得失、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的楷模。他经常自己掏钱为集体庄稼买化肥农药、为村里修桥补路、搞基本建设和修建水库。据统计，他拿出在当农民期间的29年工资总额的70%支援家乡建设。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次，他仍想着百姓，交代龚全珍“下次领工资，再买化肥农药送给贫困户”。

不怕谣言 不落俗套

甘祖昌在务农期间，始终坚持真理，敢作敢为，善于创新。一方面，他心底无私天地宽，不怕对他进行污蔑、陷害的谣言，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得到了当地广大干部群众的交口称赞和衷心拥护。1969年，江西省委调来了一位姓程的

省委书记，临上任前，毛泽东接见了 他，并指示说，“将军农民”甘祖昌在农村搞了多年，积累了许多农村工作经验，让他多多地向甘祖昌请教。这位省委书记到任后，专门邀请甘祖昌到省委做客，对甘祖昌很是客气。可是他在江西大搞“拆房建新村”“水稻矮秆化、密植化”等脱离实际的东西，引起广大农村干群的不满和抵制。后来他在一次三级干部大会上甚至批评莲花县种的是“懒人田”，栽的是“懒人禾”，并鼓吹稻种越矮越好，密植越密越好。他讲完以后，要甘祖昌表态。但甘祖昌一句话都不说，以沉默表示抗议，引起了这位省委书记的不满。之后，关于甘祖昌的各种谣言在不久后省里召开的县级以上干部大会上传播开来。有人替甘祖昌抱打不平，他却淡淡一笑地说：“他们靠造谣过日子，就越证明他们缺乏真理，让他们去造谣好了。”后来，事实证明，甘祖昌的做法是对的。而那个省委书记受到了查办。

另一方面，甘祖昌一生始终把不落俗套、求真务实作为重要的工作方法。特别是他回乡当农民后，为了建设家乡，他敢于用人，力排众议请来了“家庭出身不好”的王新安担任江山水库的技术指导，顶着压力亲自上门聘请“管制分子”、建筑师刘万基担任沿背大桥的技术员。这两个人为了报答甘祖昌的信任和关心，发挥自身特长，对工作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出色地完成了各自任务。粉碎“四人帮”后，这两个人的名声得到了洗清，并得到了平反和恢复工作。这也充分说明了甘祖昌不落俗套的用人眼光和处世风格。

1986年3月28日，为人民鞠躬尽瘁了一生的“将军农民”甘祖昌逝世。消息传开后，成千上万的群众悲痛万分，自发到他老屋前或殡仪馆吊唁。他的事迹陆续被编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和画报、连环画中供人们学习。



在黑龙江省北安市，有一个以“革命”命名的村，至今人们习惯称它为“革命屯”。“革命屯”的故事是小兴安岭上的一段红色传奇。绵延起伏的白桦林，同华北平原的青纱帐一样，是抗日英雄的游击区，留下了抗联将士们跃马兴安的光辉足迹。

巍巍兴安 燃起星火

1936年11月，民族英雄赵尚志率领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主力部队进行了第一次西征。部队历时6个月，行程千余里，在战胜日伪军围追堵截的同时，又突破了人类生存的极限，在北安南北河地区建立了根据地。

北安位于小兴安岭北部区域中心，是伪满时期的北安省省会，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滨北、齐北、北黑三条铁路在此交汇，不但森林植被茂密，而且生活物资较为丰富。

当年在南北河西岸有一个半山区屯，开明人士李殿芳于清末民初到这里垦荒种地，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田大户，故屯子被称为“李殿芳屯”。

1938年10月中旬的一天，屯里来了两个外地人，说是来寻找亲戚，三言两语打听一些情况后，随即就离开了屯子。

几天后，这两个人又来到屯子，直接找到了李殿芳，开门见山地讲明了自己的身份。

这两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从南北河密营过来的抗联六军三师政治部主任周云峰和中共地下党员王永昌。他俩向李殿芳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讲解了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抗联西征的意义和目前部队的处境，希望李殿芳能够以民族大义为重，参加到抗日救国的队伍里来。

李殿芳被抗日救国、翻身得解放的民族大义所感动，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中看到了民族救亡的希望，决定同赴抗日救亡之路。

当时对敌斗争形势异常艰巨，日伪军对抗联进行疯狂的清剿，实施了农户保甲制度，大搞检举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还对抗日进步人士使用了惨无人道的手段。时至初冬，解决部队过冬棉衣、口粮更是燃眉之急。

抗日烈焰 照耀长夜

在抗联将士的发动下，李殿芳屯尚福的媳妇张广英（尚大嫂）等抗日积极分子秘密联合起来，一个

偏僻的山区小屯，群众3天时间内就为抗联筹备了第一批物资共7麻袋，他们以进山拉套子为由，送往南北河密营。

从密营回来以后，尚大嫂等抗日积极分子很快组织了第二批抗联急需的棉衣70套、棉鞋70双、粮食近千斤，还有煤油、药品、电池、指南针等物资，并安全送到抗联密营，使抗联部队得到了物资补充，在南北河根据地站稳了脚跟。

1938年底，周云峰带另一名战士从南北河密营下山到李殿芳屯联系工作，途中遭到了日伪军的追击，突围时周云峰受伤。

在情况万分危机的时刻，又是尚大嫂把周云峰和战士藏到一个苞米楼子上，随后又转移到自己家的羊草垛里。当日伪军进屯搜查到尚大嫂家时，尚大嫂临危不惧、巧妙周旋，骗走了日伪军。

尚大嫂及时动员抗日积极分子在屯北野猪山为周云峰挖好地窖，亲自送粮、送药，一个月后周云峰伤愈归队。其间，周云峰动员了屯里的7名同志到南北河密营参加了抗联。

1939年7月，中共北安中心县委在李殿芳屯秘密成立，并把附近德都、通北两县的抗日斗争划归中共北安中心县委领导。尚大嫂任妇女救国会会长。

由于斗争形势越来越复杂，抗日救国会成员随时都有丢掉性命 的危险。但是抗日救国心切的尚大嫂等人，不顾个人安危，不但发展本屯救国会组织，还组织这些会员走出村屯，先后在周边村屯建立了多处救国会组织，发展会员120多人，形成了北安东部山区边缘村屯与抗联南北河后方基地紧密相连的抗日活动区域。在救国会和妇救会的组织下，李殿芳屯成车集粮、成批做衣服，各地救国会筹集的物资也源源不断地集中到李殿芳屯。白天准备物资，晚间集中运送，李殿芳屯成为抗日活动支援抗联的集结地，使龙北地区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

英雄气概 百世流芳

1940年11月初，由于日伪军的残酷镇压，北安中心县委遭到破坏，尚大嫂等55人被捕。审讯中敌人对尚大嫂施用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睡“阴阳床”等酷刑。可是，这位普通的农家妇女，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宁死不屈，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直到1945年东北解放，尚大嫂这些被捕村民才被解救回到了家乡。

子依据犯罪情节的轻重不同，分别予以处理。把罪大恶极的贪腐分子处以死刑，罪不至死的贪腐分子则判处适当刑罚，一般贪腐分子则进行教育，犯罪情节轻微、态度好，经教育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到位的可以继续留在党内。时任瑞金县苏会计科科长的唐仁达、中央政府总务厅“全苏大”工程处主任的左祥云、于都县军事部长的刘仕祥等都因严重贪污行为被逮捕，并且处以死刑。中央苏区干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更加纯洁，整体素质和工作作风得到极大提高。

有力支持了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

形成了苏区干部好作风。节省运动中，出台了不少政策、法令和条例，用于规范广大干部的行为，激发党员干部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反贪污浪费方面，经常在《红色中华》“黑板”栏目披露一些贪污腐化干部的腐化行为及其处理结果，对广大干部起到了有效的遏制和震慑作用。在“黑板”栏目则刊登一些苏区干部的榜样，介绍他们的先进事迹和群众的好评，对树立苏区干部好作风传递了正能量，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有力促进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培养和传播。

密切了干群关系。苏区时期，物质生活异常艰苦，盐和草腥匮乏，人民缺衣少粮，常以红薯、野菜充饥。但艰苦打不倒苏区干部群众，党的干部任劳任怨，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与广大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关系。政府工作人员牢记党的宗旨，只要群众有生产生活问题，大到耕地，小到柴米油盐，都予以关心和解决。政府得到广大工农群众衷心拥护。“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打火把访贫农。”，这首传唱于苏区时期的兴国山歌，不仅是苏区群众对苏区干部发自内心的赞颂，更是当年苏区干部与群众一起艰苦奋斗、患难相依的真实写照。

小兴安岭上的红色传奇

□ 边瑾

1950年中共中央北方根据地慰问团到李殿芳屯慰问，并送来毛泽东题写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条幅及慰问品。同时，根据慰问团的建议，将李殿芳屯改为“革命屯”，这是黑龙江省政府首批批准的革命老区。

抗联铁血今犹在，化作红霞满山红。如今，北安市正在大力挖掘和弘扬红色文化，革命村秉承红色基因，积极发展围城经济、绿色经济、旅游经济，打造出以红色资源为引擎、绿色产业支撑驱动的发展新格局。尚大嫂的儿子尚玉山，继承了母亲的高尚品格，2020年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和“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